

在优秀传统文化中重新发现“人”——“基础教育领域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时报记者 范昕茹

摄影 郑逸洁

从历史的维度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从世界的维度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又是我国独特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认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散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基础教育领域,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一直是热点话题,很多学校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在上海,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个案,从建校以来,该校就以“君子养成”为目标,形成了一套以“四教”为抓手的实践模式。

11月12日下午,研究和推广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的实践价值,“基础教育领域中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上海教育报刊社举行。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王雷泉等高校学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上海市教委原副主任张民生先生,上海跨学科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刘定一,华东师大二附中副校长孟祥萍等基础教育专家围绕“当前教育应当如何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这一主题发表了精彩观点,并就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提出的“人生教育、君子养成”的理念,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诗教、礼教、乐教、家教”的“四教”举措,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青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王凌宇做了总结发言。



王凌宇



姜乃振



王红霞



刘定一



王雷泉



陈尚君

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的回归:重新寻回教育中的“人”

2016年,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在“人生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生教育,君子养成”的口号。这是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的一次实践。

什么是“人生教育”,何为“君子养成”?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校长黄玉峰解释说:“我们既要关心孩子的成绩,也要关注孩子的和谐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成绩决定了一个孩子能否进入理想的学校,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要给予孩子终极关怀,既要关心他的昨天、前天,也要关心他的今天、明天和后天。要关

心他的人生幸福,使他拥有享受幸福的能力,提升他的素质,使他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应对。”

在确立了“人生教育”的教育理念后,黄玉峰又从《论语》和《诗经》中得到了启示,将“仁”作为教育的核心。而“君子”,则是他为“人生教育”寻找到的培养目标。黄玉峰说:“尽管孔子没有专门规定君子的标准,但从孔子的教育实践来看,君子的核心素养是具有仁德,并在为人处世中坚守仁德,尤其能同情善待他人,君子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为了培养当代君子,也为给“人生教育”寻找到的具体的实现途

径和抓手,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提出了“君子四教”。“君子四教”,即诗教、礼教、乐教、家教。“诗教”为孔子诗书礼乐等几大教育科目之首,指利用诗歌对“性灵”进行潜移默化式的培养。在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建校之初,学校就将以包括诗歌在内的国学经典学习作为立校精神之一,鼓励学生记诵诗歌,创作诗歌,进行“文化游学”。“礼教”,在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是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优良传统的高度,立足于实际,从各个维度建立起学校的规范,以“校礼”代替“校规”。“乐教”,则同时兼顾了“音乐教育”和“快乐教育”,以培养“终生

幸福的人”为目标。“家教”,则是与家庭配合,用提升家风来培养优秀的品行。

无论是“人生教育,君子养成”的理念,还是“君子四教”的实践,都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意味着什么?黄玉峰指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转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从重新寻回教育中的“人”。

“现代社会的教育中存在许多问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教育的功利化。现在,教育已经从‘应试教育’上升到了‘应赛教育’的程度。专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训

练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五条绳索紧紧地捆绑住了我们的教育。”他说,“教育中的那个‘人’消失了。”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转变现代浮躁的教育现状的重要资源。

上海教育新闻宣传中心主任、上海教育报刊社社长仲立新也指出,我国新一代年轻人想要建立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层的文化自信,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重建,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来看,传统文化能够帮助我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提炼。

传统文化落地现代社会:培养有传统文化的现代人

要使传统文化真正落地现代社会,“君子养成”和“四教”的内涵又可以做哪些深化?

复旦大学中文系原主任、博导陈尚君教授认为,“君子”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的含义都大不相同。近代以来,“君子”的内涵也几经转变。到了当代,说法更加多元。但是他并不赞成一部分人认为的学习传统文化就是恢复传统的说法,甚至把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看成是西方道德文明进入国内的后果。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一败再败,西方文明冲击之下整体文化之溃败,和明清教育的不作为有关。

“我始终觉得‘君子养成’有东西或者是中外文明之差异,但是更应该吸取两方面的长处。”他说,“‘君子养成’的根本是要有传统的人文修养,有西方现代的眼光,有个人道德之约束,更要有社会的承担,具有现代的、科学的、理性的头脑,同时又避免明清时候对于个人行为过分之约束。”这就意味着“君子”不简单地等于老实人,也并非仅仅是所谓的“谦谦君子”,他需要对社会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现代教育培养出的“君子”既要能够拥有传统的人文素养,也要有现代的科学头脑和现代的文明理念。

陈尚君说:“如果把中国传统

的教育和西方教育结合起来,应该更多地讲‘真善美’。”他指出,在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中,学校在培养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重视不够。中国教育更多强调服从、规矩,强调规范、统一、约束;而西方教育则更强调“人”,看重个人人生的历练和内心的体验。在教育层面,国内学校应该更多地鼓励学生去阅读,去创造,增强他们的想象力。

“人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辈子愉快幸福的‘悦乐君子’。我们绝不培养苦行僧,我们要一辈子愉快幸福。”在刘定一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素质教育的根基和立足点。而《论语·学而篇》中“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三个“乎”连在一起就是整部《论语》。在三个“乎”里,包含了教育目标,即培养“说乐君子”。而培养“说乐君子”的核心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刘定一认为,“四教”应该跟《论语》紧密相连。他说:“孔子用四样东西教化弟子,即文教、行教、忠教、信教。诗书礼乐是文教,行教也就是孔子的身教。”在他看来,当今社会缺乏对“身教”的强调。而忠信则应该作为“四教”的中心贯穿“四教”。而具体到黄玉峰所提的“四教”,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和学校

教育紧密配合,把诗教和礼教作为家教的重点。而乐教的内涵不应该仅仅是指音乐教育,还要使学生快乐。在礼教的教育实践方面,也不应该仅仅偏重于仪式。“礼”应该是“人心之外法”,正如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所言,礼首先讲求的是一颗仁心。

在华东师大二附中副校长孟祥萍看来,“君子养成,人生教育”所要培养的是有传统文化的现代人。“君子养成”理念和“四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而且践行了传统文化。“从学生的诗作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学生的有感而发,也能看到一个现代人

多国专家共聚第16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共话课程改革与发展

课程要回归学习,应对未来

时报记者 胡顺华

2018年适逢课程百年及中国课程改革40周年,11月2日至3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16届上海国际课程论坛。本届论坛以“课程研究:百年审视与未来想象”为主题,旨在回望百年课程,反思课程研究的历史、审视课程研究的现实、构想课程研究的美好未来。

课程反映社会变化,课程发展要回归学习

在大会主题报告环节,德国教材研究所所长 Eckhardt Fuchs 教授以“教科书研究回顾:研究、社会和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为题,分享了教材的研究领域、教材与社会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教材研究等话题。他回顾了德国近十年的教材研究历程,针对其中的不足,提出教材修订应利用数码技术,考虑社会实际需要及全球的经验及方法。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Geneva Gay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发表题为“永恒课程问题的当代挑战: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报告。她回溯了斯宾塞在1884年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问题,剖析了隐藏在这一问题背后的时代需求,并重新解读斯宾塞提出的四类知识及其背后的全人教育思想。她认为这经典一问并没有普遍和唯一正确的答案,呼吁大家根据社会和人类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思考,同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波普 STEM 教育讲席教授 Olusola O. Adesope 在题为“使用循证实践去提升教学”的报告中指出,循证实践是从严格的研究证据中得出的不同途径、实践和方法,因而具有极高的效度和信度。他论述了教育领域如何利用循证实践促进教学和学习,并基于自己的研究计划,阐明了在多媒体学习和概念图中使用循证实践的方法。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香港大学原副校长程介明在题为“迎接未来课程:方向与矛盾”的报告中强调,教育必须与时俱进,课程也必须适应多元多变的前景。他提纲挈领地探讨了在未来课程发展过程中可预见的七种矛盾,指出,返璞归真,是



与会专家 戴琪/摄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漟教授 戴琪/摄

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以人为本,回归学习,是课程发展的基本方向;解决课程与未来社会间的矛盾,是课程改革的基本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华教授以“课程百年”为契机,就“课程研究的未来想象”这一主题进行报告。她呼吁研究者们站在课程研究百年之端,回望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同时,她指出,课程是反映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强调了未来课程研究的重要性,并对未来的课程研究提出了几点展望:在研究方向层面将向宏观扩展与向微观深入相结合,在研究方法层面将理论与实验、实证与思辨有机结合。

课程改革: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应对未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局前任副秘书长陈嘉琪就“香港‘学会学习’及‘新学制’课程改革:经验与挑战”这一主题做了充分而深入的探讨。她指出,“学会学习”是香港“新学制”课程改革的核心,也是教育系统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她从宏观层面介绍了香港“学会学习”课程架构的改革历程,具体分析了“学会学习”课程改革的专业指导原则和特点,并总结了当下课程改革的有效经验与挑战。

美国纽约州新乌得勒支中学社会学系监督部助理校长 Jack P. Chan 通过对全球社会环境问题的分析,提出未来的课程应向更广阔的领域,帮助下一代更好地应对未来社会,关注更贴近人类自身的问题,并认为 H.E.S.A.T 课程应该成为“母课程”,成为解决未来发展困境的策略之一。

我国台湾中正大学教育学院原院长、核心素养工作圈召集人蔡清田教授以“台湾学生核心

素养课程研究的审视与想象”为题,分析了2005年到2013年台湾学生核心素养研究的成果,以及 K-12 中小学一贯课程纲要核心素养与各领域连贯体系研究。他认为,“教育阶段核心素养”到“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中小学一贯课程中核心素养与学科领域的统整过程,有创见地提出了核心素养融入 K-12 课程垂直连贯与水平统整的架构,为核心素养融入学科教学提出了未来设想。

日本体育科学大学教授、日本学科教育学会会长池野范男基于日本的教育现状和日本学科教育研究的历史与挑战,综合论述了学科教育学的内涵、框架以及特征,指出学科教育学拥有“学科教育实践”这一独有的研究对象,因此应该往返于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开发之间,以改善、改革学科教育实践为目标。

课程育人:立足本土开辟“中国道路”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

究中心张华军副教授在题为“在课程中培育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与杜威、梁漱溟的当代对话”的报告中,采用比较教育哲学的方法,基于对当代社会变化的审视,分析了杜威和梁漱溟的相关思想。通过探讨“对自我转变的信念从何而来”这一问题,她概括出“独特且具包容性的个性”的内涵。最后,她建设性地从开拓课程育人的叙事空间、审美维度和道德维度说明对于课程育人的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周勇教授发表了题为“蔡元培与中国课程改革的美育传统”的报告。他在回顾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内涵及历史影响基础上,探讨了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当代意义,认为中国当代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应融入蔡元培的美育传统,以满足国家建设美好生活的发展需要,并为建构中国本土课程美学奠定基础。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赵伟黎博士在以“‘借助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课程文化理性’的范式

探讨”为题的报告中,由中国的“校风、学风、学风”和“福柯的大笑”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海德格尔和福柯的语言本体思维和历史考古视角,探究了孔子“风教”思想渊源。最后她以自身的跨学科研究为例,探讨了在21世纪该如何“借助西方理论挖掘中国课程教育文化理性”。她指出,一方面要确保不重蹈二十世纪发生的文化殖民的覆辙,另一方面又要力争跟西方课程教育理论进行平等的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吴刚平教授聚焦孔子的课程思想,作了题为“‘思无邪’与孔子课程思想的特征”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孔子时代的课程实践,概括出诗教课程的内容结构和基本特征,并探讨了诗教课程与“思无邪”的价值观念、诗教课程与善喻之言的课程话语、诗教课程与“叩两端”的思想方法三个主题,最后基于社会的现实条件,对孔子诗教课程思想展开了当代想象,为现场听众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考路径。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高德胜教授在以“‘接童气’与儿童经验的生长——论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对儿童经验的处理”为题的报告中,指出新课程改革之前,德育教材“儿童化”的欠缺既违背了道德要求,也不合道德教育的本义。通过对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分析,他肯定了其对儿童经验的“接童气”的处理,认为《道德与法治》解决了德育教材与儿童经验相互隔离的痼疾,为德育教材开辟了一条“中国道路”。

>>>声音

课程改革如何迎接未来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崔允漟教授:

课程改革是整个世界的中心议题,中国近20年来的课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进入课改转型的关键期,面临如何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的难题,而多元化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难题,迎接未来的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

基于程朱理学的大传统和基于陆王心学的小传统,大传统意味着追求人为的教育,小

传统是可以调和过度人为化的自然法。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与互动,可从六个层面总结课程改革中的中国经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自然法(整体主义)是中国教学改革的基本知识观,对于自然法有自己的观点与立场。

韩国科学教育协会主席、首尔国立大学物理教育系教授 Jinwoong Song:

围绕“模仿游戏:对学校科学课程发展的反思”,过去两个世纪全球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学校科学课程的整体发展

是对当代科学设想的模仿,这种“模仿游戏”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校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同时,对学校科学从“模仿”到“创造”充满期待。

美国纽约州起源高中创始校长 John Banks:

2002年至2018年间,在Bloomberg和De Blasio两任市长的管理下,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系统性组织和哲学转变,以及课程发展的相应变化和影响。对此次研究的意义进行分析,提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